

“香港”作為魯迅研究的資源

——以舊詩專論及《抖擻》雜誌為例

何杏楓·丘庭傑*

目 录

- 一. 引言
- 二. 研究回顧
- 三. 香港與三部魯迅舊詩研究
- 四. 學院裡的魯迅研究：以《抖擻》雙月刊為例
- 五. 總結

一、引言

自1927年魯迅赴港演講以來，香港一直不乏討論魯迅的文章、論著，但早期魯迅研究學史一般不會處理香港的魯學發展問題，¹⁾ 另一方面，魯迅的域外傳播史專著也未曾處理香港的個案。²⁾ 香港的魯迅研究長期未能進入學界視野，處於缺席的狀態。這一點跟香港的歷史因由有直接關係。1949年以後，兩岸各走異路，香港處於夾縫，卻因此避過了“造神”與“查禁”兩劫，³⁾ 在相對開放和

* 何杏楓，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丘庭傑，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生。本文曾在2017年12月“第三屆韓中魯迅研究對話會”上發表，承蒙席上專家學者指教，特此感謝。

1) 例如袁良駿《當代魯迅研究史》。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有專節討論曹聚仁《魯迅評傳》，形容是“作為特例在中國魯迅學史上處理”。袁良駿：《當代魯迅研究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上卷·二），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96頁。

2) 例如王家平，《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1909—200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3) 在1949年建國以後，共產黨大力推崇魯迅，大陸的魯迅研究因而產生左傾和扭曲的現象，並

自由的風氣之下，形成了容許多種關於魯迅的論述共存和互動的場域，這種情況從五十年代開始，維持到八十年代末才與大陸整合接軌。這段期間，魯迅在香港的傳播是以異於兩岸的軌道和節奏來發展的。時至今日，魯迅研究在東亞地區已經成為一門顯學，其學史及傳播史已經得到充分的討論，但香港魯學發展的問題卻停留在起步的階段。近年，學者林曼叔推出首部香港魯迅研究史，⁴⁾為這個課題奠下根基，正是相關討論方興之時。從學史和傳播史的角度出發，不少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例如論者如何借用香港的邊緣位置來傳播魯迅思想和進行研究？本地論者在兩岸政治化的魯迅研究現況中又如何取態？作為當時有較大自由度、可以暢論魯迅話題的華語地區，香港在東亞地區魯迅學傳播過程中，擔當了甚麼角色？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香港在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間在東亞地區魯迅學傳播過程中的位置和角色，提出香港作為魯迅研究資源的特點和方法。近年香港學者開始討論“香港作為方法”理論思想，⁵⁾香港的主體性一再成為關注點。本文以“香港”作為魯迅研究的資源為題，是希望透過個案呈現出香港在東亞版圖上的角色，重申香港在國際學術和思想的流動中擔任了關鍵的位置。本文首先簡述目前對“香港魯迅研究”的研究概況，接著以香港出版的三部魯迅舊詩研究，以及本地學術刊物《抖擻》雙月刊為例，呈現論者立場觀點的多樣性，以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神化”並加以利用，以達到政治的目的，直至1976年文革完結後，情況才逐漸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國民黨在1953年於台灣實施戒嚴，魯迅書籍一律被查禁，直至1987年才宣佈解嚴。

- 4) 林曼叔編，《林曼叔文集IV：魯迅論稿·香港魯迅研究史》，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6年5月。
- 5) 竹內好在1961年於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發表了“作為方法的亞細亞”演講，1963年出版《亞洲主義》，牽起了亞洲為研究對象的理論思想。溝口雄三在1989年出版的《作為方法的中國》則是隨之衍生的、以“中國作為方法”的論著。直至2003年，台灣學者陳光興再為“亞洲作為方法”建構理論框架，2006年出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一書，揭示台灣本土文化研究的盲點。至於“香港（研究）作為方法”，則是2014年由香港學者朱耀偉撰文提出，關注香港在亞洲版圖中的角色身以及香港的主體性。見朱耀偉，《導論：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關於香港論述的可能性》，載朱耀偉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香港：中華書局，2016年，第10—28頁。

及他們如何善用位居邊緣的特點開拓或延續特定議題的研究。本文同時闡述香港如何成為了東亞區域中的學術交匯點，接通中國大陸、台灣、海外（新馬、日本、美國）。最後，本文提出“香港”可以作為魯迅研究的資源，並便這方面的工作可具體分為四點。本文認為在香港發表的魯迅評論、論文、專書或其他材料，不單是一些域外補充資料，而是拼合魯迅學世界版圖的寶貴資源，其重要性不容輕視。

二、研究回顧

自1927年魯迅赴港演講以來，魯迅評說一直是文化界的重要課題，早期以報刊評論、紀念活動為主，五十年代起則出現學理化的專著、傳記、論文。香港文學研究先行者盧瑋鑾教授最先整理相關資料，其論文《香港文藝界紀念魯迅的活動記錄》是第一篇有意識整理香港魯迅學史的研究。不過，香港魯迅學史的討論一直未見踴躍，此後三十年間除了孫立川《歷史的斷片：“魯迅與香港”的三個考察》一文外，論題一直無人問津。直至近年，楊傑銘和林曼叔兩位學者重拾香港魯迅學史的研究工作，二人分別在框架視角和史料方面創出新天，為這個久歷寂寞的課題帶來生機。本節回顧先行研究，以作下文論述的基礎。

盧瑋鑾《香港文藝界紀念魯迅的活動記錄》（1981年）最初發表於《抖擻》，後收入其《香港文蹤——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一書。這是最早一篇考察魯迅在港接受情況的論文，盧氏以1936年至1941年六年間香港紀念魯迅的情況為範圍，以求窺見當時新文藝活動的部份面貌。這份論文為後來者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例如該段時期報章刊登悼念魯迅文字的狀況和各個文學社團組織籌辦紀念魯迅活動的情況，既有豐富的資料性，同時具有開創意義。及至2001年，孫立川在《香港作家(1998)》期刊上發表《歷史的斷片：“魯迅與香港”的三個考察》一文，將考察範圍從盧氏論述的六年擴展開來。文章分為

“魯迅在香港演講的背景及反響”、“特殊時期（1936-1949）的特別紀念”和“香港學生的新課題——以魯迅試題為考量”三部份，前兩部份主要參考盧瑋鑾、黃繼持、鄭樹森三人選編的幾本早期香港文學資料選，為1949年以前香港報刊和文藝活動等資料作出了初步整理和基本考察，而第三部份則從香港教育課程中的試題考察九十年代香港學生對魯迅的接受程度。這份論文抽取了三個年份不同的考察點，以三個不同面向探討魯迅與香港的關係。以上兩篇論文都是以資料整理為主，為“魯迅”在香港接受情況提出初步的現象描述和解釋。

楊傑銘的《冷戰時期魯迅思想的台、港傳播與演繹》（2014年）和林曼叔的《香港魯迅研究史》（2016年）都是發表於近年的研究成果。上述四位研究者都具有海外學術研究的經驗，但只有楊傑銘是以外地人的身份去關注這個與香港本土關係密切的題目。⁶⁾ 楊傑銘是台灣年輕學者，在台灣成長和學習，2009年在台灣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以《魯迅思想在台傳播與辯證（1923-1949）——一個精神史的側面》取得碩士學位，及後來港，於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冷戰時期魯迅思想的台、港傳播與演繹》乃其博士論文。楊氏旨在探討冷戰體制下魯迅思想在台港兩地的傳播與演繹，著力處理有關國民黨反共體制、東亞大一統文化架構、逆反與在地化的權力關係等問題。論文涵蓋了蘇雪林反魯論述、鄭學稼《魯迅正傳》、曹聚仁《魯迅評傳》、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化史話》、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夏濟安、舒蕪和李歐梵的魯迅研究等。這部論文強調了當時香港具有公共空間的特點，有助於重現魯迅思想在香港互動的歷史語境。這個互動的關係構成了本文論述的基礎，並將之延續至其他史料之上作討論，冀望再思香港魯迅研究本身的特殊性。

6) 盧瑋鑾和孫立川曾經在日本京都大學分別擔任研究員和攻讀研究學位，林曼叔則曾經到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進修。盧氏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學者，林氏自1962年起旅居香港，而孫氏則在1992年底移居香港。

若說楊氏論文貢獻在其視角與框架，林曼叔《香港魯迅研究史》的建樹則在於史料量繁面廣。林曼叔為本地編輯前輩，多年來從事魯迅研究，筆耕不輟，2016年出版《林曼叔文集》共五卷，其中第四卷便由“魯迅論稿”和“香港魯迅研究史”組成，各有二百頁篇幅。所謂“香港魯迅研究史”，實際上不僅僅以香港的魯迅研究為內容，也包括魯迅赴港演講的資料、魯迅逝世後在香港的悼念情況及紀念活動等。林氏著作在史料發掘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是香港首部研究魯迅在香港傳播情況的專著，對於一些重要材料都有簡明地作出專節處理，有助後來者從宏觀的角度理解這些議題的輪廓。

在楊、林二人的研究基礎上，本文將焦點置於香港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間的魯迅研究發展，將一些較少論及的史料回置在香港與東亞地區的互動脈絡之中，藉以探討香港魯迅研究可以如何論述以及成為資源。這段時期四部最早的魯迅舊詩專論，其中三部均與香港有淵源；此外，香港的高等教育在五、六十年代有很大的發展，學報刊物應運而生，並在七、八十年代開始有魯迅研究的題目，故此，學院派如何研究魯迅並與外界對話，是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不論鄭子瑜、張向天、江天的魯迅舊詩專論，或是王浩、吳茂生、黃繼持、周佳榮等在《抖擻》雙月刊的論文，都屬於香港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間魯迅研究的重要紀錄，對於我們了解香港在東亞區域魯迅學傳播過程中擔當的角色有直接的幫助。以下從歷史脈絡化的角度開展論述，就論者背景、論述內容、出版脈絡和社會背景等作出評述，以討論香港魯迅研究在宏觀圖景下的位置。

三、香港與三部魯迅舊詩研究

在四部最早的魯迅舊詩專論中，除周振甫《魯迅詩歌注》（1962年）外，其餘三部包括鄭子瑜《魯迅詩話》（1952年7月）⁷⁾、張向天《魯迅舊詩箋注》

7) 鄭氏一書雖有包括魯迅的新詩，但舊詩仍佔一定篇幅，且論及魯迅的詩觀，因此也包括在內。

(1959年)、江天《魯迅詩新解》(約1970年,即姜添《魯迅詩注析》),均有在香港出版流通。⁸⁾本節以個案的形式,將三部魯迅舊詩專論回置在香港出版和傳播的脈絡中,就其中的文化身份和作品接受情況作出分析,從而探討香港在東亞魯迅研究版圖上擔當的角色。

鄭子瑜《魯迅詩話》

鄭子瑜(1916-2008)⁹⁾在1952年7月於香港出版《魯迅詩話》,¹⁰⁾是第一部有系統地研究魯迅詩歌的專著。在這部書面世以前,談論魯迅舊詩的文章主要有許壽裳《〈魯迅舊詩詩集〉序》、林辰《魯迅的詩》、王亞平《魯迅先生的詩及其詩論》、王士菁《魯迅先生的舊詩與〈離騷〉》、錫金《魯迅詩話》等,儘管不乏深刻的觀點,但始終缺乏一本比較具系統的研究式論著。《魯迅詩話》共分三十五節,主要探討魯迅新詩、舊體詩、散文詩及譯詩的藝術成就,並討論魯迅雜文中關於詩的論述,包括《摩羅詩力說》和《詩歌之敵》等雜文。在分析方法上,鄭子瑜《魯迅詩話》主要從用辭、意象、詩風等分析魯迅詩歌;雖也提及社會意義,但沒有按革命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思想等方法去解讀詩歌,著重魯迅詩歌的文藝性多於現實性,這點跟後來的張向天、江天有明顯的分別。

由於南洋政局在四、五十年代動盪不穩,若論出版業,香港有地緣之利。鄭氏在港出版這部書,或許跟其經歷有關。事緣他在三十年代末赴南洋後寫出了《〈阿Q正傳〉鄭箋》一書,但幾經波折和散失,此書一直未能順利面世,最終

8) 據筆者所見,在1970年以出版的魯迅舊詩研究專書還有司空無忌《魯迅舊詩新詮》和南京大學編《魯迅詩注》。前者在學界少有提及,本地大學院校均未藏此書,筆者在網上僅能略見全書之一二,所用資料多有失誤,且多作謠語,學術價值極低;後者暫未得見原書,估計流通不廣。

9) 鄭子瑜(1916-2008),祖籍福建,1939年前後南渡婆羅洲,五十年代初移居新加坡,1964年和1978年分別受日本早稻田大學和東京大東文化大學聘用為教授,1984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先後居港二十年。

10) 鄭子瑜,《魯迅詩話》,香港:大公出版社,1952年7月初版,10月再版,1955年修訂三版。

要在九十年代才尋回出版。¹¹⁾ 回置當時經歷戰爭的歷史環境，地域確是文人出版著作時的實際考慮。香港當時是英國殖民地，社會相對太平，在抗日戰爭後有較為穩定的環境，加上港口的地理位置有利於在南洋、東亞地域間運輸，這些考慮應在鄭氏盤算之內。

這本書的接受情況也值得注意。《魯迅詩話》出版後頗受歡迎，短時間內已經重印，¹²⁾ 1955年又有修訂三版。這部著作在當時引起了不少迴響，鄭氏在1952年10月13日寫的《再版後記》提到，自己接獲“國內外許多讀者的來信”。換言之，這本書在短短三個月已得到了不少讀者回應。值得注意的是，鄭氏當時身處南洋，這裡說的“國內外”所指不明，但本文認為此書主要流通於香港、星加坡（星加坡在1965年才正式宣佈獨立建國）兩地。持這個看法的原因是：一、《三版前記》提到“近二三年來，星、港報紙、雜誌，對於是書的批評，不下數十篇，可謂譏譽參半。”¹³⁾ 可見這部書在香港、星加坡兩地是通行，而且引發讀者迴響的。二、《魯迅詩話》在內地或流通不廣，至少在1981年張恩和編《魯迅舊詩集解》一書所附之“魯迅詩歌研究資料編目索引”未見此書。¹⁴⁾ 儘管這部書未在內地普及，但對鄭氏而言，香港儼然成為了南洋北望神州、傳播魯學的重要平台。

張向天《魯迅舊詩箋注》

張向天（1913-1986），筆名丙公、黃鉞等，193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37年南下香港，早期曾旅居過粵西地區，1946年起在香港定居，從事教育工作。張氏的《魯迅舊詩箋注》在1959年8月經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¹⁵⁾ 這很可能是

11) 鄭子瑜，《〈阿Q正傳〉鄭箋》，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

12) 鄭子瑜《〈魯迅詩話〉再版前記》：“《魯迅詩話》一書，於去年七月一日出版，兩月後便已售罄。大公書局經理來信通知，並商議再版的事宜，實在出我的意想之外。”《魯迅詩話》三版，第i頁。

13) 同上書，第i - xii頁。

14) 張恩和編，《魯迅詩歌研究資料編目索引》，《魯迅舊詩集解》，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9-452頁。

國內讀者首次接觸到的魯迅舊詩專論，頗受歡迎，1962和1964年也分別有再版和三版，內容各有訂正，1973年在香港雅典美術出版社有上下兩冊的重訂本，作出很大程度的修定。這部專論共有48題66首，按時間排序，另附斷句三則。每篇先標明詩題、所收文集書名、原詩，然後輯錄創作時間、本事等背景資料，接著是作者所寫的解讀、字詞箋注、白話譯文。這部著作在搜集和整理資料的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箋注部份超越了鄭子瑜《魯迅詩話》，為魯迅舊詩定下了穩固的根基。

若與鄭子瑜《魯迅詩話》一書比較，張向天重視魯迅作為“愛國詩人”的一點尤為明顯，一再強調魯迅“愛祖國”、“愛人民”的一面。特別在1973年香港雅典美術出版社重訂本裡，我們可以看見張向天對當時中國的想像直接影響到他對魯迅舊詩的判斷。在這部重訂本裡，張氏自言受文化大革命影響，識見大有不同，因而作出了大幅度的重寫，例如以毛澤東、姚文元等言論作為權威來解讀魯迅詩，¹⁶⁾ 其政治信仰已蓋過了魯迅詩的文學性，雖然因此學術價值打了折扣，但回置在香港魯迅研究的脈絡中，這現象背後所呈現的身份認同和民族想像問題，卻值得深思。張向天自四十年代中起就定居香港，但其民族立場並未有因此而隔斷，香港的殖民處境反之激發了他捍衛民族主義的傾向。在理論層面而言，文化大革命曾經使大陸魯迅研究走上左傾的歧途，但身到場外的張向天卻依然對之抱有美好的憧憬，間接說明了香港不應簡化為隔絕的空間，反而是流通的空間，這裡的魯迅論述亦受多種歷史外力而產生影響。

15) 張向天：《魯迅舊詩箋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8月，初版。

16) 張氏在《魯迅舊詩箋注》原版和重訂版期間，曾撰有《毛主席詩詞箋注》一書，這可能也影響到張向天的文藝思想。另外，張向天又寫有《魯迅作品學習札記》、《魯迅詩文生活雜談》和《魯迅日記書信詩稿札記》。《毛主席詩詞箋注》，香港：香港文匯報，1968年；香港：崑崙出版社，1969年。《魯迅作品學習札記》，香港：上海書局，1975年1月；《魯迅詩文生活雜談》，香港：上海書局，1977年10月；《魯迅日記書信詩稿札記》，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11月。

江天《魯迅詩新解》

第三部在香港出版的魯迅舊詩專論是江天¹⁷⁾的《魯迅詩新解》。這是一部在1970年前後寫成了的魯迅舊詩專著，範圍包括魯迅舊體詩五十九首和新詩十二首，每首在注釋後另附一段“講解”。這部書經香港文教出版社發行，又以姜添為筆名經香港集思圖書有限公司發行，書名作《魯迅詩注析》，兩書實際出版先後次序未明，但內容大致相同。¹⁸⁾江天《魯迅詩新解》有明顯的政治思想和立場，他在前言提到：“在簡單的註釋之外，並試以正確的觀點，聯繫時代背景和詩人思想發展的過程作講解。這是一個新的嘗試。”¹⁹⁾他認為魯迅舊詩可反映其“進步”歷程：

作為革命民主主義者的魯迅的作品，內容深沉，悲憤交集，既說明魯迅思想的逐步深刻化，也說明他始終在一邊戰鬥，一邊探索著道路。他在頑強的戰鬥中，在“許多血和許多淚”的教訓面前，不斷嚴格地“解剖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終於在以後發展成爲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一九二七年以後，直至逝世以前，魯迅作爲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他的詩無論思想性、戰鬥性都有了一個質的飛躍，而且反映社會內容的廣闊豐富，也遠遠超過前兩個時期。晚年詩作，更加顯出戰鬥的青春活力，最爲可貴。²⁰⁾

17) 原名吳天才（1936- ），祖籍福建，出生於馬來西亞，早年就讀於新加坡大學和馬來亞大學，是學者兼詩人。有關江天身份的資料較少，未知曾否到港。

18) 筆者所見的《魯迅詩新解》，署名江天，出版社列“文教出版社”，惟未標出版年份或版次，前有內容提要：“魯迅先生的詩，也和他的其他文學作品一樣，有深刻的政治內容，高度的藝術造詣和光輝的時代意義。本書輯錄魯迅先生的舊體詩五十九首，新詩十二首，加以簡短的註釋，並試以正確的觀點，聯繫時代背景和詩人思想發展的過程作一講解。”，目錄前三頁“前言”。至於《魯迅詩注析》則署名姜添，出版社列“香港集思圖書有限公司”，版次為1971年4月三版，未見前書內容提要頁，也未有“前言”。兩書另一出入在於扉頁不同，前書印有魯迅五首舊詩手跡，後書只印有三首魯迅舊詩手跡，與前書五首完全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集思圖書公司”地址為“香港文咸東街八十三號頂樓”，“文教出版社”則為“香港文咸東街八十三號四樓”，而印刷公司同為“大千印刷公司”，地址卻有異，分別是“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和“香港英皇道六五七號五樓”，兩書標價同為港幣二元。筆者估計兩書出版年份有異，但相距應不遠。就內容而言，兩書是一致的。前書印有前言，故本文以此版本為準。

19) 江天，《魯迅詩新解》，香港：文教出版社，年份從缺，第1頁。

20) 同上書，第2頁。

江天以政治思想先行的方式來為魯迅舊詩作箋注，導致了某些判斷出現明顯的曲解，例如解讀《湘靈歌》為魯迅“歌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的紅色革命根據地”的創作，表現了魯迅“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對革命根據地的無限嚮往，對毛主席的無限熱愛”，²¹⁾ 難免有過度詮釋的成分。整部書填滿了解放的憧憬，例如解讀《報載患腦炎戲作》時稱“作者以他的徹底革命精神和堅韌的戰鬥意志，運用犀利無比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器，殺得中國文壇上的一切馬鬼神人仰馬翻。”²²⁾ 本文的重點不在江天的左翼詮釋是否合理，而是希望借此指出：江天與鄭子瑜同樣來自南洋，其論述卻可以南轅北轍，香港魯迅研究的多樣性由此亦可見一斑。

此書的出版資金和流通情況均有待查究，²³⁾ 但本文希望從一則域外接受的例子來說明香港位置的重要性。當代魯迅舊詩的重要研究者寇志明 (Jon Eugene von Kowallis) 就提及自己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修讀學士學位時曾到台灣交流兩年時，在香港購得江天的《魯迅詩新解》，成為了他最初接觸魯迅舊詩專論。他讀後覺得魯迅舊詩很有意思，但也產生了不少疑問，之後他到夏威夷大學便開始研究魯迅的舊詩。²⁴⁾ 這個例子印證了香港為知識流通中介點的角色，再次說明了香港在魯迅思想和論著的出版與傳播事業上扮演著關鍵的位置。

以上透過魯迅舊詩研究的例子，我們得見香港作為魯迅學交匯點的具體情況。論者或自南洋而來，或從大陸南渡到港，他們借助香港在出版方面相對寬鬆、言論相對自由的優勢，在這裡著書立說，香港因而成為了東南亞地域裡傳播魯迅思想的重要交匯點，在魯迅研究的版圖上應得以更多的關注。同時，我們會發現這些研究的立足點有一定的差異，即使同樣來自南洋的學者亦可以

21) 同上書，第42-45頁。

22) 同上書，第97-99頁。

23) 據知此書有可能曾經在大陸內部發行過，參 [澳] 寇志明 (Jon Eugene von Kowallis) , 《我的魯迅詩歌研究之路》，《東吳學術》(第4期)，2015年，第81-85頁。

24) 同上註。

對同一研究對象作出截然不同的論述，甚或在定居香港的論者筆下，論述亦會隨外在歷史潮流的影響而產生變易，構成了豐富的研究面貌。

四、香港學院派的魯迅研究：以《抖擻》雙月刊為例

上述魯迅舊詩專論的出版可視為五、六十年代由民間文人延續的魯迅研究學理化路線，本節則延伸至六、七十年代的另一脈絡：香港學院派的魯迅研究。在1949年以後，香港高等教育發展出現了新的變化，隨著新亞書院（1949年成立）、崇基學院（1951年成立）、聯合書院（1956年成立）逐一成立，並在1963年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打破以往英國殖民地只有一所大學的慣例。在這個背景之下，學術刊物亦應運而生，學院學報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聯合書院學報》、《新亞學報》等，跨學院組織的有《抖擻》。一般而言，學院學報的創立是為了讓學院師生有發表研究成果的平台，但《抖擻》由於不直接隸屬任何學院組織，性質也有不同，它有意聯繫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成為跨地域知識交匯的平台，這點跟本文討論香港於學術交匯整體圖景的位置有直接的關係，因此本文選之作為個案討論。

本文首先簡介刊物背景和魯迅論文刊登情況，然而討論海外華人學者王浩和吳茂生的魯迅研究論文，展現香港如何為海外學術觀點提供了傳播和流通的平台，接著以1981年《抖擻》“魯迅誕生一百周年紀念專號”為對象，從該期十一篇文章中選取其中本地學者黃繼持和周佳榮的論文，探視本地學者如何承接魯迅研究的話題並開展對話。本文認為，這些論文可以體現出香港在七、八十年代魯迅研究交流互動的關係中如何擔當知識交匯點的角色。

《抖擻》雙月刊背景

《抖擻》向海外中國知識分子提供出版園地交流知識與觀點。它在1974年1

月創刊，由香港大學數學系教授梁鑑添和姚德懷，以及其他香港院校及教育界人士合辦，是一部半學術性文化刊物，目的是為了向海外中國知識分子提供出版園地交流知識與觀點，範圍涵蓋語文、科技、藝術等，對七、八十年代的學術研究有重要作用（至1983年停刊），大陸、台灣、香港本地或外國的學術成果都能通過《抖擻》傳播，也受內地讀者歡迎。²⁵⁾ 1977年，《抖擻》第19、22期分別刊登了兩篇以魯迅為題的海外學術論文，是該刊首次刊登以魯迅作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並且皆列為首篇，可見該刊對魯迅研究的重視。另外，1981年9月第46期有“魯迅誕生一百周年紀念專號”，刊出共十一篇文章。來自本地的包括黃繼持《魯迅與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馬幼垣《論〈中國小說史略〉不宜注釋及其他》、盧瑋鑾《香港（1936-1941）文藝界紀念魯迅的活動》、杜漸（李文健）《魯迅與科幻小說》、周佳榮《魯迅與蔡元培》、楊玉峰《魯迅和魯彥關係初探》、黎活仁《魯迅、秋瑾、1905年的取締規則事件》，來自大陸的則有戈寶權《〈阿Q正傳〉的世界意義》、熊融《“奴隸叢書”停頓原因考述》，另有朱正《湖南人民出版社今年出版魯迅研究讀物的工作計劃》一文以推廣魯迅研究書籍，專號第46頁也刊登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十六卷本《魯迅全集》的廣告。就《抖擻》刊載的魯迅論文而言，當中包含了西方、大陸和香港本地的學術觀點，專號陣容鼎盛，論題角度豐富，於香港魯迅學史而言，價值厚重。以下分析將集中焦點在探視香港魯迅研究之於全局擔負何等意義。

魯迅研究的西方觀點：王浩、吳茂生

第19期刊出的是王浩（1921-1995）的《借鑒魯迅的求索》，這篇文章從題目到內容看似平平無奇，回置於七十年代的語境卻頗見其匠心。²⁶⁾ 王浩當時為美國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邏輯學教授，²⁷⁾ 作為在邏輯推斷

25) 周有光，《我所度過的時光：周有光百年口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66頁。

26) 王浩，《借鑒魯迅的求索》，《抖擻》（第19期），1977年1月，第1-14頁。文末寫有1976年11月29日初稿。

27) 王浩在中國成長，1943年西南聯合大學數學系畢業，1945年清華大學哲學系畢業，1946年前往美國入讀哈佛大學，1948年取得邏輯學博士學位，留校任教，1967年到洛克菲勒大學

技能“非常專業”的“非專業”魯迅研究者，王浩在文章開首就為魯迅的角色定位，寫道：“就專業說，魯迅是一個文學家。但他又是思想家和革命家，超出了他的以及一般知識份子所說的專業。”²⁸⁾ 接著按魯迅的生平並創作逐步推移，從魯迅的經歷到作品解讀，又轉入魯迅的心境與思想，嘗試以相對客觀的方式重現魯迅的原貌。相較其時大陸或部份左翼南來文人的魯迅研究，這篇論文在論證方法上有明顯的區別。王浩以對史實與作品不過份的推斷作為方法，力除政治上的前設，不取毛澤東思想或馬列主義等“權威”來論證魯迅思想與作品。文末寫：“從早年起，魯迅便認識到自己不是一個政治家，把精神集中於文學擴而於文化。”²⁹⁾ 說明了文章的基本核心，即將魯迅視為“文學”本位的專業人，然後可以是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不是政治家。儘管王浩並未在文章裡嚴格區分“革命家”與“政治家”兩者，但總體而言挑明了魯迅角色定位的核心問題，在學理上有本質性的意義，跟當時大陸的主流觀點並不相同。王浩這種具深度的魯迅研究反思，代表著魯迅研究的西方觀點，並透過《抖擻》而傳入東亞區域。從此可見，《抖擻》為學術交流提供平台，容納了西方魯迅研究的新觀點。

第二篇文章是吳茂生的《魯迅與俄羅斯文學》，刊登於《抖擻》第22期。³⁰⁾ 論文首先介紹魯迅對俄國文學感興趣的背景，接著就魯迅對安特萊夫、阿爾志拔綏夫、果戈理三位俄國作家的接受展開論述，說明魯迅選擇譯介部份作品的原因，又分析魯迅作品如何受之影響，從而整理出魯迅在接受俄國文學時取捨的標準。吳茂生在香港成長，在香港大學畢業後赴英國牛津大學研究院修讀中文系，接受西方學術訓練，面對跨文化研究的課題自然與當時大陸的研究進路有別。就筆者所見，這篇論文是繼1949年馮雪峰的《魯迅創作的特色和他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入集時改名為《魯迅和俄羅斯文學的關係及魯迅創作的獨立特色》）以後，再次有學者對魯迅與俄國文學關係作出系統性的探索，跟稍

擔任邏輯學教授。

28) 同上，第2頁。

29) 同上，第14頁。

30) 吳茂生，《魯迅與俄羅斯文學》，《抖擻》（第22期），1977年7月，第1-13頁。

後王富仁在1983年出版的《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構成了域內 / 外對讀參照的可能，從而補足我們對相關研究史的理解。³¹⁾ 由於《抖擻》有意識地聯繫各地的研究成果，王浩和吳茂生的論文都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在香港流通，說明了從西方魯迅研究傳播到東亞的過程中，香港的學報也成為知識傳播的重要渠道，是理解魯迅學史的寶貴資源。

托派討論：黃繼持《魯迅與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及其他

托洛茨基的文藝理論對魯迅在思想上的影響，在九十年代以前一直是大陸的學術禁區，香港學者黃繼持的《魯迅與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有意處理這個敏感的話題。自從1927年托洛茨基被史太林政權鬥垮以後，托派的政治主張便被“正統”的左翼理論家視為一無是處，其文藝思想亦被簡化和割裂。魯迅在1925至1927年間曾受到了托洛茨基革命與文藝思想的影響，這原是不爭的事實，卻在很長的時間裡被有意地迴避或忽視。黃氏借用香港的言論空間，抱著務實求真的心態去探討魯迅如何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是值得敬佩的。黃氏採用了非常客觀和嚴謹的方式整理魯迅與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關係，跟另一部由托派份子一丁（樓國華）在香港出版的《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1979年）比較來說，可謂截然不同，前者是學理之探析，後者是信仰之印證。八十年代《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的來龍去脈尚未曝光，不少人先入為主以之作為魯迅反對托派的鐵證，然後“理所當然”地將魯迅早期受托派思想影響的可能亦抹殺，但黃氏卻嚴謹地作出判斷：“魯迅後期怒斥過中國的托派份子，但當1926年頃，魯迅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曾經通過托洛茨基的書這一項事實，記錄俱在，不能曲隱。”³²⁾ 如今《答》信事實水落石出，自然更見作者治學之審慎。黃氏原定以上下篇分述“史實勾稽”和“理論闡述”兩部份。《抖擻》刊

31) 這裡指的是王富仁的碩士論文《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碩士論文完成年份為1981年，此前應有發表部份章節，後於1983年結集時補寫一章。王富仁討論的俄國作家除了吳茂生所提到的三位外，還有契訶夫。見王富仁，《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32) 《抖擻》（第46期），1981年9月，第4頁。

出的正是上篇，豈料在流通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下篇最終也沒有寫成。黃氏在1986年將文章收入集時加上按語：

本文乃應《抖擻》編者組織“魯迅誕生一百周年紀念專號”而作，寫得有點繁瑣的學究氣。之所以如此，除因照應變刊物的學報性質外，還想用比較客觀嚴謹的學術態度，來處理一項當時中國文藝政府思想上還相當“敏感”的問題。中國大陸對“革命”的聖化與魯迅的神化，所造成學術思想的僵化，情況在七八十年代之交開始有所改變，但那時仍談不上學術全無“塔布”。《抖擻》常與內地學術界交流，但拙文寫作發表於香港，不應劃地自圍。但該期專號內地流通，頗有阻滯，可能拙文有些地方，誤闖“禁區”，而拖累刊物。當時甚以為歉，因之計劃中的下篇，也就沒有勁寫下去了。³³⁾

應當說明的是，黃氏論文初發表時尾隨附錄，即托洛茨基著、魯迅譯之《亞歷山大·勃洛克》一文。附錄最首有編者（該期特約主編為黎活仁）按語：“[……]這是一篇對魯迅研究有重大意義的譯文，但向不見錄入任何公開發行的魯迅文集，四人幫倒台後出版的各種《魯迅年譜》，也未見提及。現在藉機刊佈，以廣流傳。”³⁴⁾ 魯迅受托洛茨基的影響，大概就是黃氏所誤闖的“禁區”，卻同時說明了文革過後大陸的學術禁區至八十年代初仍未盡除。³⁵⁾ 及後在1990年，另一位香港本地學者陳勝長以“托洛茨基的文藝理論對魯迅的影響”為題去延續討論。³⁶⁾ 這兩篇論文都是較早關注托洛茨基對魯迅影響的研究，距離海外與大陸對此作出學術化的討論為早。³⁷⁾ 以上說明了香港本地學者能善用香港言

33) 見黃繼持，《文學的傳統與現代》，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7月，第79頁。

34) 見《抖擻》（第46期），1981年9月，第15-18頁。

35) 這點在一丁《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書底後記也有提及，實情應該要向當時主編《抖擻》的知情者查詢，但一丁的說法大概也可作參考：“前一篇[指一丁《魯迅與左聯關係的始終》]也曾投寄過《抖擻雙月刊》，來信極表歡迎，但過了半年不見刊登，我去信查詢，終於退了回來。碰壁的原因我知道，他們打探到了我是個異端分子，所以前恭而後倨。”

36) 陳勝長，《托洛斯基的文藝理論對魯迅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1卷），1990年，頁285-311。結集時題目改為《托洛茨基的文藝理論對魯迅的影響》，《考證與反思：從〈周官〉到魯迅》，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91-236頁。

論空間的自由度來發揮作用，去接觸當時在大陸較為政治敏感的課題，為後來的研究作出了堅實的基礎探索。

周佳榮的《魯迅與蔡元培》

周佳榮的《魯迅與蔡元培》有意與台灣學者鄭學稼對話，文章採用了鄭氏《魯迅正傳（增訂新版）》（1978年）書中同題，有修正其說之意圖。他認為鄭學稼書中在史學上有毛病，有意對當中的一些說法作出補充和修正。周佳榮當時任教於浸會學院歷史系，1980年出版了《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一書，對於蔡元培有過比較深入的研究。論文以史實出發，非常仔細地整理了有關魯迅與蔡元培的資料，將蔡元培對魯迅的影響客觀地勾劃出來，在讀者面前羅列出歷史證據。鄭學稼《魯迅正傳》書中認為“推動魯迅向左走並與中共上層工作者直接接觸的人是蔡元培”，周氏在文末直接反駁了這種說法。他認為鄭氏將蔡元培的作用任意誇大，除了認識宋慶齡和加入民權保障同盟兩點之外，缺乏有力的論證，又以為“若在蔡元培一生眾多的往還人物中突出魯迅，認為與他的關係“比較密切”，也是不當的。”³⁸⁾ 若說兩岸的魯迅論述當時囿於政治立場而互有衝突，周氏論文則代表了一種香港學院派立場。他們非常自覺地將學術與政治分隔開來，少有人身攻擊或納入政治判斷的情況，往往是從資料出發，因而在兩岸的學術互動中具備一定的參考價值。

這一期《抖擻》刊載了三篇來自大陸的論文，包括戈賓權《〈阿Q正傳〉的世界意義》、熊融《“奴隸叢書”停頓原因考述》和朱正《湖南人民出版社今年出版魯迅研究讀物的工作計劃》，為兩地魯迅研究互通消息、促進學術交流的意

37) 據筆者統計，大陸對托洛茨基與魯迅議題有專門章節去討論的是張直心《魯迅文藝思想與蘇聯早期文藝思想之比較研究》（1990年），正式引起學界關注是在1993年左右，近年逐漸成為了新近的研究熱點之一。至於海外，在1992和1994年分別由日本學者長堀祐造和英國學者格雷果爾·班頓（Gregor Benton，又譯班國瑞）發表了相關論文。

38) 見鄭學稼，《魯迅正傳》增訂新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8年7月15日；引文見周佳榮，《魯迅與蔡元培》，《抖擻》（第46期），1981年9月，第68頁。

圖不難察見。香港學者黎活仁在八十年代初更是積極推動這方面的工作，在《抖擻》、《開卷月刊》等刊物一再引介大陸魯迅研究的動態，以及譯介日本魯迅研究的最新情況。香港集合大陸、台灣、海外（新馬、日本、美國）魯迅研究這點地域特色，從五、六十年代起由民間學人帶動，七、八十年代學院派共同努力，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中期都在魯迅學的版圖上發揮作用。

五、總結

本文以三部魯迅舊詩專論及《抖擻》雙月刊中的四篇論文為例，突出香港魯迅研究在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間的面貌，闡明這段時期香港在魯迅研究世界版圖上擔當了重要的角色。首先，香港的魯迅研究保留了不同身份、立場的魯迅論述，體現其多樣性。張向天南來香港，嶺南卻未隔斷其左翼情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反而加劇其政治情懷，再版的舊詩箋注充滿了他對共產事業的美好想像；鄭子瑜、江天同樣來自南洋，專論的立足點與論述卻截然不同；海外華人學者王浩和吳茂生借助香港發表他們的域外觀點；本地學院派則有黃繼持、周佳榮等以去政治化的立場作出客觀、持平的研究。可見，此一時期香港社會上容納了多種不同的論述方向和學術觀點，在兩岸各走異路的時候保存了魯迅研究路線的多樣性。其次，香港為魯迅思想傳播和學術研究提供了地緣優勢。不論是南來文人還是南洋學者，均借助了香港在出版方面相對寬鬆、言論相對自由的特點，在此著書立說、傳播魯學；香港也因而成為了東南亞地域裡傳播魯迅思想的重要交匯點，《抖擻》雙月刊以交匯知識為任，從起初輸入海外學者觀點，到1981年專號有意接通中、港兩地，為魯迅研究互通消息、促進學術交流，在魯迅研究的傳播方面極具意義。

在林曼叔《香港魯迅研究史》以前，魯迅研究史著作或魯迅域外傳播專著裡，均未有為香港劃出專門章節來論述。“魯迅學在香港”或者“香港的魯迅學”往

往只流於關注曹聚仁《魯迅評傳》、夏氏兄弟、李歐梵等的研究點上，認識不免是片面的。在相關資料逐漸得到學界關注的情況下，本文認為“香港”可以作為魯迅研究的資源，這方面的工作可具體分為四點：一、收集和保存香港文藝報刊、雜誌、電影、舞台等方面有關魯迅的材料；二、針對香港出版的魯迅專論著作開展個案研究，注意論者的身份背景，著重這些論著在魯迅學於世界流通傳播方面的意義；三、留意香港五十年代起魯迅研究逐步學理化、學術化的過程；四、透過香港具多元性的魯迅論述，觀察差異的原因和意義，並作出學理上的探索。隨著追跡1927年魯迅到港以來九十年間的材料，我們冀望能填補這些空白點，重新關注魯迅學在香港傳播與流轉的過程，從而呈現魯迅在世界版圖上更立體的面貌，讓香港可以成為補足魯迅研究的資源。

參考文獻

- 《抖擻》雙月刊, 第19、26、42期, 香港, 1974、1977、1981年。
- 朱耀偉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 香港:中華書局, 2016年
- 林曼叔編,《林曼叔文集IV:魯迅論稿·香港魯迅研究史》, 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 2016年5月。
- 林曼叔編,《香港魯迅研究資料匯編(1927-1949)》, 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 2017年10月。
- 盧瑋鑾,《香港文藝界紀念魯迅的活動記錄》,《香港文蹤——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 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 1987年。
- 黃繼持,《魯迅與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抖擻》(第46期), 1981年9月。
- 黃繼持,《文學的傳統與現代》, 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 1988年7月。
- 江天,《魯迅詩新解》, 香港:文教出版社, 年份從缺。
- 姜添(江天),《魯迅詩注析》, 香港:香港集思圖書有限公司, 1971年4月三版。
- 孫立川,《歷史的斷片:“魯迅與香港”的三個考察》,《西還集——魯迅研究札記》,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01年。
- 周佳榮,《魯迅與蔡元培》,《抖擻》(第46期), 1981年9月。
- 周有光,《我所度過的時光:周有光百年口述》,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5年。
- 陳勝長,《托洛斯基的文藝理論對魯迅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1卷), 1990年。
- 陳子善,《筆路藍縷, 功不可沒——略談鄭子瑜的〈魯迅詩話〉》,《讀書良友》(第34期), 1987年4月。
- 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上卷·二),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2005年。
- 張向天,《魯迅舊詩箋注》,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59年8月, 初版。
- 張向天,《毛主席詩詞箋注》, 香港:香港文匯報, 1968年;香港:崑崙出版社, 1969年。
- 張向天,《魯迅作品學習札記》, 香港:上海書局, 1975年1月。
- 張向天,《魯迅詩文生活雜談》, 香港:上海書局, 1977年10月。

- 張向天,《魯迅日記書信詩稿札記》,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11月。
- 張恩和編,《魯迅詩歌研究資料編目索引》,《魯迅舊詩集解》,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 鄭學稼,《魯迅正傳》增訂新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8年。
- 鄭子瑜,《魯迅詩話》,香港:大公出版社,1952年7月初版,10月再版,1955年修訂三版。
- 鄭子瑜,《〈阿Q正傳〉鄭箋》,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
- 一丁,《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香港: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出版,1978年。
- 楊傑銘,《冷戰時期魯迅思想的台、港傳播與演繹》,香港嶺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 吳茂生,《魯迅與俄羅斯文學》,《抖擻》(第22期),1977年7月。
- 王富仁,《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 王浩,《借鑒魯迅的求索》,《抖擻》(第19期),1977年1月。
- 王家平,《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1909-200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澳]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我的魯迅詩歌研究之路》,《東吳學術》(第4期),2015年。

Abstract

Hong Kong as Resources for Lu Xun Studies: Focusing on Classical Poetry Monographs and *Dousou* [抖擻]

Hoyan, Hang-fung Carole; Yau, Ting-kit Kevin

Lu Xun visited Hong Kong for thrice in 1927, laying the seeds of “New Literature” in the literary circle of Hong Kong, which at the time was dominated by classical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1937, modern Chinese writers and scholars began to flock to Hong Kong to take refuge from the civil war in China. Enjoying the freedom in Hong Kong, they founded variou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began to commemorate and publish on Lu Xun,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Lu Xun Studies” in Hong Kong. As compared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Hong Kong is free from the deification and the censorship of Lu Xun after 1949, hence providing a relatively-free literary field for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discussions on Lu Xun.

This paper claims that Hong Kong serves as valuable resources for “Lu Xun Studies,” not only in that it offers an abundance of resources for the circulation and reception of Lu Xun, but also in that it provides a different reading of Lu Xun as compared to that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the East-Asia regio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provides a survey on the present research on the “Lu Xun Studies” in Hong Kong.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ree monographs on Lu Xun’s classic poetry and on the periodical *Dousou* [抖擻],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circulation of “Lu Xun Studies” in the East-Asian region. The paper will also reflect on the notion of “Hong Kong” as methodology of Lu Xun Studies.

Key words : Lu Xun, Lu Xun Studies, Hong Kong, Classic Poetry Studies, *Dousou*

투 고 일 : 2018. 4. 10. / 심 사 일 : 2018. 4. 15.~ 2018.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8. 5. 20.